

# 严复“信达雅”与“非正法”翻译的社会历史统一性解读

吕世生

(南开大学 外语学院, 天津 300071;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天津 300035)

**摘要:** 严复主张翻译应循“信达雅”, 却直言《天演论》是“非正法”翻译, 关于其翻译理念与文本实践的分歧由此而起, 百年无有定论。本文尝试摆脱既往孤立的分析思路, 全面分析“信达雅”、翻译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多重联系, 发现先前对严复思想的研究未能准确解读“信达雅”三个概念的内在联系, 这是理解“信达雅”乃至严复翻译思想的关键所在。“信”“达”两字的概念互为依存, “达”“雅”两字互为联系。“信”是目标, “达”是手段, “雅”是服务“达”的辅助手段。“信达雅”是严复翻译理想的表述, 《天演论》的非正法翻译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翻译实践, 是趋近翻译理想的历史过程, “信达雅”的理论原则与《天演论》翻译实践是历史过程的统一。

**关键词:** 信达雅; 严复; 翻译; 翻译行为

## Soci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Yan Fu's Three-Character Translation Principle and His "Abnormal Translation" Strategy

LYU Shishe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enter for Central Government Documentation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035, China)

**Abstract:** Yan Fu insisted that translation conform to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while he practiced "abnormal translation", thus giving rise to years of debate over the relationship of his translation thought and practice. I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either the study of Yan Fu's translation thought has been undertaken without taking into account his translated version, or focus has bee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ource text and a target text alon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his Faithfulness and Expressiveness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end and means, respectively, though the previous views of them were also reasonable in a sense. Three-character translation principle embodies his ideal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to approach the ultimate goal of translating, that is, being faithful to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volution and Ethics* is a product in the particular stage of socio-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Yan Fu;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ct

《天演论》中文译本问世百年有余, 一直享有汉译名著之誉。虽为汉译名著, 译家严复的自我定位却是“非正法”翻译, 并且告诫后学, “学我者病”, “来者方多, 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sup>①</sup> 翻译本应遵循正法, 严复何故违背常理, 弃正法而就非正法, 而且非正法翻译严复可做, 后学却不可做, 令人费解。“非正法”翻译, 源自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的说法, “取便发挥, 实非正法”。他

<sup>①</sup> 文中严复原文均引自《天演论》“译例言”, 《严复集》第五册,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1986, P. 1321-1322, 后同。

对此的解释是“译文取明深意义,不斤斤于字比句次,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而意义不悖本文”。这段话的具体体现是他在译文中添加的大量所谓“案语”,即《天演论》翻译过程中出于译文读者接受的考虑,他多处添加的个人阐释、评述。“非正法”翻译严复给出了较为明晰的解释,而“正法”翻译却未见如此明确表述,不过透过其中的只言片语作些推测也不为难。

关于《天演论》中文文本的翻译属性界定,“译例言”云:“题曰达悌,不云笔译。”显而易见,该文本不能算作翻译,只能算作“达悌”。如勉强归类翻译,也只能添加“非正法”加以限定。非正法翻译预设了正法翻译。前者以“取便发挥”为特征,后者显然不应出现译者“案语”,至少不应过多。这样,正法翻译或已接近普遍认同的“忠实”概念。此处严复正法翻译的内涵虽为推断,但其“译例言”开篇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准则却不失为这一推断的文本依据。先贤严复一方面推崇正法翻译理念,另一方面却又践行非正法翻译实践,这一矛盾引发了近乎百年的众说纷纭,成为思想文化、翻译研究领域严复情结的持久焦虑。

### 一、理论与实践的背离与统一之争

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箴言确立了正法翻译标准,关于这一标准的价值、意义,赞成者有之,斥责者亦有之。赞成者谓严复的“信达雅”确立了翻译的正法,是“译人楷模”,是汉译佛经以来数百年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升华,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梁启超 1998:66;胡适 1998:66;刘宓庆 1993:3;许钧 1998:5);斥责者谓严复的翻译实践背离了翻译正法,“其义不信”,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瞿秋白 1998:112),实为假“雅”之名,行“不信”之实。赞成者点赞的同时多未考虑其与《天演论》翻译实践的关系,斥责者则主要愤然于三字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背离。赞成与斥责之争实为严复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之争。针对严译《天演论》不信的指责,赞成者曾以其翻译的时代、读者对象、翻译动机等为由,回应说“信”的准则不适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评价(王宏志 2007:115)。这一回应实则预设了严复的翻译实践背离了其翻译理念的前提,因而对《天演论》翻译是否失信于原文的指责不构成回应,严复“非正法”翻译合理性的有无自然无法澄清。

近来又有论者认为严复的翻译理念与实践具有统一性,认为严复的“信达雅”是其《天演论》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天演论》翻译采用的是“达悌术”,“信达雅”是达悌术的指导思想(黄忠廉 2013:84)。这一研究的思路立足《天演论》的文本翻译实践,反观“信达雅”思想与《天演论》文本翻译实践的关系。该研究对“信”的涵义作了重新解释,认为严复“信”的所指是“有增有减,有改有译”。这一研究由对严复翻译理念的孤立语义分析转向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研究思路较前有了扩展,但其对“信”的解释可能偏离了其语义基础,与严复“译例言”的相关解释不一致,因为严复关于《天演论》翻译的非正法之说意味着《天演论》的文本翻译已经背离了“信”的本义,所以才称之为非正法翻译。显然,严复的“信”的概念至少包含了通常理解的“忠实”的含义,否则无法解释非正法翻译这一说法,因此,把“信”解读为“有增有减,有改有译”与严复的本义不符,也与其非正法翻译这一说法的逻辑不合。

此外,就方法论而言,这一研究仅限于理论与翻译文本的联系,这与先前孤立解释“信达雅”语义的思路有所区别,但未能进一步考察《天演论》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缺少了一个维度,因而,对严复非正法翻译的分析难说全面。

严复翻译思想与《天演论》翻译实践的背离与统一之争的另一要点是“信达雅”三字之间的相互关系。近年有论者认为,“信”是对原作者负责,“达雅”是对译文读者负责,以此反驳早前“信”当包含“达雅”之说(赵迎春 2011:38)。由此推出的结论自然包含有背离的意味。与此不同的另一主张是,“达”是信达雅的核心,“信”是部分信于原作,更是取信于读者(黄忠廉 2016:34);“达”是信达雅的灵

魂(黄忠廉,陈元飞2016:98)。关于原作、译作、读者的关系两种说法有相同之处,也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对“达”的如此彰显似乎使“信”失去了安身之所。这一说法无疑是为统一之说张目。这在“译例言”的相关表述,以及原作与译作关系的文本现实中都难以得到印证。

严复的“信达雅”是千年之久的中国汉译佛经翻译思想的集大成之说,百年来深入人心,被视同翻译的正法,因之严复也可视同为翻译正法的集大成者。集正法翻译大成的译家其翻译实践竟背离了翻译正法,问题的实质可能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分析非正法翻译的内在逻辑,解读理论与实践是否背离是关键所在。由于既往的研究或孤立地解读“信达雅”的所指,或孤立地解读《天演论》的翻译文本,都与翻译行为的复杂联系不相匹配,因此无法揭示严复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本质联系,所以本文不仅要把“信达雅”的翻译思想与《天演论》的翻译文本联系起来考察,还要对译者的非正法翻译实践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把非正法翻译的现实约束纳入分析过程,这体现了翻译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行为这一基本认识。

## 二、“信达雅”所指与《天演论》翻译文本的联系

翻译实践是复杂的社会历史行为,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某一翻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如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思潮、意识形态观念等,这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共识。

“信达雅”的翻译理念与《天演论》文本翻译实践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文本翻译实践又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又构成了《天演论》翻译实践与社会历史条件的联系。非正法翻译的解读要全面考虑理论与实践,实践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多重联系,因为这些联系共同制约了严复的翻译策略选择。具体分析应该从这种制约机制入手,分析其影响制约过程。这是严复翻译研究的基本思路。既往的研究由于忽略了严复理论与实践,实践与社会历史条件三个维度的复杂联系,这一方面导致论者的主观解读不能得到客观印证,另一方面文本翻译实践的制约因素被屏蔽在外,其翻译策略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因素未被考虑,因此,关于“信达雅”的真实所指无法获得广泛认同,严复何以采取非正法翻译的原因就无法得到解释,进而导致“信达雅”翻译理论与《天演论》文本翻译实践关系之争一直不能解决。

“信达雅”的真实所指是认识非正法翻译的起点,分析严复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联系首先要从分析“信达雅”的真实所指开始。

### 1. “信达雅”所指的解读

重新解读严复的“信达雅”内涵,不难发现近百年来“信达雅”的多种解读往往仅限于孤立的三字语义分析,这种孤立分析的结果往往偏离了严复的本意。严复的“信”除具有“忠实”的含义,还与“达”的部分意义重叠。就这一意义而言,“信”和“达”两者组成了一个意义整体。通常的解读将其完全分开,“信”的意义的完整性受到了损害。“达”不仅具有通顺、流畅的意义,还有到达、通达、晓畅、明白等意义,而后者更是“达”的意义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信”与“达”的这种联系,严复在“译例言”中给出了具体解释。“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文“信”于原文之难超出常人想象,但仅仅信于原文却未能实现“达”,译文表达不透彻,不能抵达译文读者,读者不能全解其意,那么,译与不译就没有区别了,所以,也就无所谓达了。由此看来“信”的目标的实现需以“达”的实现为条件。本意为到达的“达”追本溯源又表由此及彼的过程。用于翻译,则有由此文转换到彼文之意。然而一直以来,“达”却仅被演绎为通达,取流畅、通顺之意,认为英语的“expressiveness”或“fluency”是其等值概念。这是片面的理解,这种理解连带影响了“信”的解读。

关于“达”在此语境中的具体含义，“译例言”中有专文论述。“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假令徬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细读严复的解释，“达”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改变句法；（二）吃透原文，用中文重述；（三）原文理解的难点，添加解释、评述。前两点为通常理解的“达”的含义，而第三点则超出了通常的语义范畴，为严复在特定语境下的独有意义，它正是我们通常忽略的意义。

作为译者，严复之所以“前后引衬”，添加解释，其目的是“以显其意”，突出原文的文本意义，以此保证译文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原文的主旨，所以，严复宣称：“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达”的目的原是服务于“信”。经此分析，可以看出，“信”是严复翻译的理想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准确、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思想、要旨，译者往往需要或前或后添加补充信息或加以解释，因为原文谈论的是“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内容是新近的思想理论，科学成果，常人难以共喻。这些补充信息、解释、评述是“达”的体现，是实现“信”这一目标的手段，“信”和“达”又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

“信达雅”的“信”其内涵不是仅仅完整无缺地复制原文的思想内容，而是以译文读者的准确理解为前提的复制，他的“信”不仅意味着忠实原文，也意味着确保读者的准确理解。这超越了对“信”或“忠实”一般的理解，是“信”与“达”两个语义的统一，二者不能割裂，否则理解就产生偏颇。

为了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翻译主张，严复又在“译例言”中引用古语解说“信达雅”的本意。“《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句古语与“信达雅”三字对应。前句出自《易经》，意为君子要注重修养，立身诚实，现演化为写文章要表达作者的真实意图。此“信”为信于作者本心之意，作者的真实所想与文字表述应有一致性，此为诚，诚即信；中句为孔子所言，意为写文章要明白晓畅，易于理解；末句意为写文章要使用雅言，即规范语言，且有文采，才能为更多的读者接受。就此而言，雅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达”，所以，可理解为是服务于“达”的手段。严复称：“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做文章要依此三个尺度，翻译亦然。就首句而言，严复的意思是翻译同原文写作一样要表达原文作者的真实思想感悟。翻译要表达原文的思想，而非其他，这相当于“信”的内涵，这是翻译的目的。然而，如此的“信”仅为翻译目标的一个层面，表达的内容最终要为读者通晓，以致接受，这是另一层面。忠实表达原文的内容且为读者充分理解这是译者的全部诉求，是严复“信”的概念的完整解读。先前认为，“信”是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达”是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这样理解的“信”与“达”的意义割裂了严复的“信”与“达”两者的内在联系，是片面的。严复的“信”与“达”互为补充，是原文、译文关系和译文、读者关系的连续和统一。这种理解比通常的理解更为丰富与复杂。仅以“忠实”来诠释“信”未免有望文生义之嫌，会因此失去探讨其丰富内涵的机会，进而对严复翻译实践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断然否认。

## 2.《天演论》翻译文本对“信达雅”的偏离

对“信达雅”的上述解读仍然是一种主观解读，尽管有“译例言”的表述为文本依据，因为这没有触及这个理念本身的复杂联系，这与此前多年的研究思路并没有本质区别。为了摆脱先前研究的局限，必须转向关注其本身的复杂联系，观察“信达雅”翻译思想与文本翻译实践的相互关系。与翻译实践相比照，从实践中获得严复本意的客观印证，这才符合事物普遍联系的思维，才是获得客观认识的必要条件。

以严复《天演论》翻译为例，赫胥黎原著共12册，严氏所译仅为其中第9分册中的“序论”与“本论”。《天演论》中文译本共约3万3千余字，其中案语约为1.7万字，案语为译者对原文的阐释、评述。译文中加入了近原文总量一半以上的译者阐述，这种译本确与通常的译本有所不同。中译本书名本身也非通常默认的“忠实”翻译。原著名为 *Evolution and Ethics*，字面意义为“进化与道

德”。从书名可知这是关于自然进化与其引发的人类道德关系的思考的专著。《天演论》中文书名在原文的“演化”词义之上增加了“天”一词。中国文化中的“天”是“人”的道德的来源、宇宙的最高主宰,具有超自然的神性,往往带有“天命”“天理”的感情色彩,而 evolution 是一个中性词,不具有这种色彩,“天演”的联想意义超出了 evolution 的语义范畴。严译使用汉文化概念置换了原文的概念,语义偏离明显,然而这种偏离与汉唐佛经翻译的“比附”策略有相通之处,更能引起汉语读者的共鸣,而易为其接受。尽管如此,“天演”这一汉语表述与英语 evolution 的概念意义相似大于相异,并不会对“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一基本思想在汉语中的完整表述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相反似有强化汉语读者接受其意蕴之效。十分明显,汉语读者的知识结构、文化心理可能是严复选用“天”这一概念的主要考虑。

严复的翻译实践背离了普遍默认的忠实翻译的尺度,与通常接受的“信达雅”的理解也不相吻合,这成为近年翻译研究、文化研究争论的焦点。但其争论的前提是“信达雅”等同于忠实翻译。这一前提的形成可能归于对“信”望文生义的诠释,以及人们生活中对翻译活动的经验感受。然而,从前述分析中不难看出,“信达雅”并非等同于普遍理解的“忠实”,因此,严复的翻译实践与其翻译理念背离的前提或许并不存在。再者,如果说严复的“信达雅”思想与其“非正法”翻译实践具有一致性,那么他对后学“学我者病”的告诫则无法解释。欲解开其“信达雅”与“非正法”翻译关系的谜团,还应该进一步解释其时与该翻译文本生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

### 三、非正法翻译与社会历史条件的联系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 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之后,其思想文化、科学研究成果日新月异,异彩纷呈,呈现“译例言”所言的“新理踵出”之势,而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依旧延续几千年的发展节奏,社会发展开始大幅落后于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步导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新思想“难于共喻”。由于思想观念、科学技术的落后,西方的新概念新思想在中文里随之缺乏相应的表达方式。严复对此深有体会,进而发出慨叹:(翻译时)“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思想观念的差异、语言表达的缺乏造成了中文翻译的重重障碍,往往在中文中即使找到了相应的表达,通常也很牵强,意义偏离在所难免。中国社会文化现实制约了严复的翻译实践,他不得不采用“前后引衬”“取便发挥”为特征的“非正法”翻译,其用心不难理解,非如此无以突破语言文化的障碍,原文主旨也难有效地抵达中文读者。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滞后,因此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是,西方一些新概念可能接近或类似中文的概念,这类概念的意义往往只是与原文概念意义部分或大部分重叠。这种情形下意义的翻译还可以取得大致接近的效果。然而,另一些情形下,某些新的知识之于中国的普通读者几乎完全陌生,中文中相应的概念“渺不可得”,这时如果硬译而非采取非正法翻译则有可能造成严复称之为“译犹未译”的结果。这些情形也都可能是严复翻译策略选择必须面对的社会历史现实制约。赫胥黎原著涉及物理、数学、逻辑学、社会学等知识,在严复看来,这些知识即便原文读者也不易理解,因此,被严复弃之不译。严复选择的“绪论”“本论”基本不深入此类知识,这些可理解为他为“达”的关照。此外,其翻译目也是翻译章节选择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严复的“非正法”翻译是突破目标语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是历史性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愈益频繁,接触不断加深,思想、语言差异产生的隔阂会逐渐缩小,“非正法”翻译也会逐渐失去其历史价值,读者对译者的阐释、评述的依赖性将逐渐下降,因此翻译实践将会不断趋近“信”的目标。这或是严复告诫后学勿学“非正法”翻译的深意。

他这样做的另一原因可能来自他对其时普通译者个人能力的担忧。“译例言”云:“海通以来,象

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斯二者则已寡矣。”18世纪中西大规模文化交流开始,致力于翻译者遍地皆有,但能同时达到“信”“达”要求的人才却十分少见。译界高人如严复者有能力“取便发挥,而意义则不悖于本文”,他人则难有此种把握,所以,除社会历史条件以外,个人能力不足也可解释严复何故告诫后学勿效法“非正法”翻译。无论是普遍的译者个人能力的不足,或是文化差异的制约,或是严复的告诫,都不具有普遍意义,都是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情形。

#### 四、结语

“信达雅”是严复翻译思想的概括,更是他翻译理想的表述,这种理想无法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具体的翻译实践不能摆脱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要求具体的翻译实践要根据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现实加以调整,而非执著于翻译理想,试图突破其历史局限,这只能得到“译犹未译”的结果。严复对翻译与社会文化现实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对翻译的历史局限性更了然于心,他的“非正法”翻译是其深邃思想的体现,是趋近翻译理想的历史过程。“正法”翻译是翻译实践的普遍理论原则,“非正法”是特定历史阶段具体翻译实践的调适。严复《天演论》的“非正法”翻译反映了翻译理想与翻译现实的历史统一。

严复“非正法”翻译实践的内涵十分丰富,体现了迄今的多种翻译思想,反映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也体现了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包括了原文文本导向的思想,也包括了目的语文本导向的思想,是翻译理想、翻译目的、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制约的理性权衡与选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要深入挖掘这种翻译理性的内涵,回归理性,增强“走出去”的翻译战略的可行性。

就思想交流的意义而言,严复的“非正法”翻译取得了成功,这一成功赖于其理性的非正法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理性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要理性地对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要充分认识目标语接受的社会历史现实制约,并研究突破这些制约的理论策略。

#### 参考文献:

- [1] 胡适.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2] 黄雨石.关于严复的“信达雅”三难说兼及“宁信而不顺问题”[J].语言与翻译,1991,(3):40-43.
- [3] 黄忠廉.“信达雅”与“达旨术”关系论[J].外语学刊,2013,(6):80-84.
- [4] 黄忠廉.“达”:严复思想体系的灵魂[J].中国翻译,2016,(1):34-39.
- [5] 黄忠廉,陈元飞.从达旨术到变译理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1):98-106.
- [6] 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3,(2):2-3.
- [7] 梁启超.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8] 刘宓庆.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任务[J].外国语,1993,(2):2-6.
- [9] 瞿秋白.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10]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 [11] 许钧.在继承中发展[J].中国翻译,1998,(2):4-5.
- [12] 赵迎春.从信达雅看文学翻译[D].复旦大学,2011.

**基金项目:** 本文受“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收稿日期:** 2015-12-24

**作者简介:** 吕世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